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书系

资料卷

大辛庄遗址研究

方辉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书系

大辛庄遗址研究

(资料卷)

方 辉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收录了自1936年大辛庄遗址发现以来的相关报道与研究文章，共48篇。主要内容分为两卷：一为资料卷，收录了大辛庄遗址历次调查、发掘资料的简报；二为研究卷，包括考古学研究和商史与甲骨学研究，前者涉及大辛庄遗址的年代、性质以及遗物的传统考古学研究和科技手段分析，后者以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材料为主讨论了商史与甲骨学相关问题。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对大辛庄遗址这一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研究爱好者和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辛庄遗址研究：（全2册）/方辉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2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书系）

ISBN 978-7-03-039206-0

I. ①大… II. ①方… III. ①古城遗址（考古）—资料—汇编—济南市—商代
IV. ①K87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335号

责任编辑：刘 能 / 责任校对：胡小洁 李 影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9 插页：1

字数：1 130 000

定价：268.00元（全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代序)

方 辉

济南大辛庄遗址不但是我省已知面积最大的一处以商文化为主要堆积的古代遗址,而且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研究历史最长的商代遗址之一。随着2003年春季的考古发掘,尤其是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有关的专业期刊分别在“考古前沿”^①和“考古新发现”^②栏目中以最快的速度对大辛庄甲骨文做了报道,我们与《文史哲》编辑部合作,及时组织了“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学者们对大辛庄甲骨文的内容、性质及学术价值,做了很好的研究与阐释^③。实际上,此次发掘的收获是多方面的。除了甲骨文之外,商代中期贵族墓地、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和有铭青铜器等遗迹遗物同时出土,不仅在大辛庄遗址是第一次,而且在海岱地区乃至我国整个东部地区来讲,也都是十分罕见的。

2010年,山东大学考古系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济南市大辛庄遗址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发掘。此次发掘在蝎子沟以西揭露一处生活区,出土了丰富的日常生活遗物;蝎子沟以东揭露一处商代墓地,并发现一座回廊式夯土建筑基址^④。上述发现再次说明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在商代前期后段至后期早段,为我国东方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处遗址,在商代考古与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从1936年大辛庄遗址的发现至今已经有70多年的光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辛庄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也是我国东方地区考古、尤其是商代考古发展历史的见证。因

①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6期。

② 方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3期。

③ 方辉等:《“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文史哲》2003年4期。

④ a. 方辉、刘秀玲:《济南大辛庄遗址考古发掘再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24日第三版;

b. 王兴华、刘秀玲、王惠明等:《2010年度济南大辛庄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4月15日第四版。

c.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10期。

而，回顾大辛庄遗址发现和研究的历史，不但对于认识和总结以海岱地区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商周考古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对于展望和把握未来该地区商周考古的发展动态和走向，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大辛庄遗址的发现

最早将大辛庄遗址的发现公诸于众的是英国人Frederick Sequier Drake，汉名林仰山。据林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报道，我们得知，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的林仰山曾经对胶济铁路济南至周村段做了多次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遗址，大辛庄遗址就是其中之一。他随后于1939年^①、1940年^②两次发表了关于大辛庄遗址的专门调查报告，还有两篇关于石器^③、陶器^④的综合性报道，也涉及大辛庄的出土遗物。

上述材料显示，林仰山最早获知大辛庄出土文物的消息是在1935年春季。次年冬，林氏率学生来此进行考古调查实习，在“蝎子沟”南部折向东端的北岸，发现了被村民挖掘过的土坑。据说，这个土坑是1935年春当地农民无意中发现的，坑内出土的遗物有数量众多的骨镞和几件青铜器，完整的青铜器很快便流入古董市场，以后下落不明。到1936年冬，林氏前来调查时，只剩下了一些在古董商人看来没有价值的遗物。几经商谈，这些遗物为林氏购得，成为第一篇调查报告的基本素材^⑤。这批遗物以骨镞和骨料为主，还有一件铜觚的口部和几件残破的兵器如铜戈、铜刀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林氏回英国休假一年。一年后回到济南，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购得同坑出土的其他文物，而且，有些铜器残片竟然可以与第一批器物拼合复原。原来，发现这个器物坑的农民后来从坑的底部又挖掘出一些文物，并一直珍藏在身边。1939年春老人去世，其后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这些宝贝。也就在这年的5月，这些文物成为林氏的收藏。这一近乎传奇的发现刊登在他的第二篇专题报告之中^⑥。据日本年轻考古学者黄川田修见告，林氏的这些藏品，部分陶器现存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其他较为珍贵的青铜器等则下落不明。

关于大辛庄遗址最初的发现，当地村民的传说与林氏所说情况稍异。据说，遗址的发现者是王书田，已于几年前去世。笔者在发掘期间，于2003年5月13日下午有幸采访到王书田之妹，现已七十多岁的村民王英田。

① Drake F S. Shang Dynasty find at Ta-hsin Chuang, Shantung. *The China Journal*, 1939, 31(2).

② Drake F S. Ta-hsin Chuang again. *The China Journal*, 1940, 33(1).

③ Drake F S. Stone implements from Shantung. *The China Journal*, 1940, 33(4).

④ Drake F S. Ancient pottery from Shantung. *Monumenta Serica*, 1940, 4(2).

⑤ Drake F S. Shang Dynasty find at Ta-hsin Chuang, Shantung. *The China Journal*, 1939, 31(2).

⑥ Drake F S. Ta-hsin Chuang again. *The China Journal*, 1940, 33(1).

据王英田回忆，大辛庄遗址的最早发现是在1935年的深秋。秋收播种之后是一年相对闲暇的时节，王书田利用农闲从村东南的蝎子沟拉土垫圈，从拉回家的土中发现一些骨质和铜质的箭头，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吸引了其他人前来挖掘。结果，因土洞掏得太深，发生坍塌，差点出人命，挖掘遂中止。后来的几年中，王书田又陆续挖掘出一些文物，收藏在家中，生活拮据时就变卖些箭头、戈头等小件文物换点钱物。其中大件的有铜鼎、铜簋等七八件器物，曾委托济南东门河清酱园老板牛星三代为出售未果。大约在1941年，这些大件器物由王英田的姨父、时在天津徐世昌门下任职的杨厚斋携带至天津，据说卖给了天津、北京和石家庄一带的公私收藏者。王英田兄妹家中的藏品，也陆陆续续卖给了古董商人，例如一件铜觚，便以五十块大洋卖给了一个名叫赵洪发的古董商。遗憾的是，因时过境迁，这些早年的出土物现归何方已无从查考。有些甚至可能已经流散到海外。例如，现藏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in Chicago）的一件铸造精美的青铜戈，便来自大辛庄遗址。只是该馆的档案记录过于简略，其入藏经过也已无从得知^①。因解放前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混乱无序，类似这样文物出土后流散海外的例子，当不在少数。

关于大辛庄遗址发现的时间和最早发现者，林氏的记载与王英田的回忆稍有出入。可能的情况是，最初的发现者与文物收藏者并非一人，发现的时间也略有先后。我们只能说，大辛庄遗址的发现者是当地村民；而该遗址为学术界所知晓，则应归功于林仰山教授。林氏对山东考古有开创之功，后来任职于香港大学，对香港考古和中华文化的传播贡献甚大，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国际友人^②。

二、大辛庄遗址考古简史

林氏的报告虽是出自调查，但仍有不少有价值的信息。首先，报告中首次报道了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这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其中铜觚、铜戈、铜矛、铜镞、陶鬲、卜骨和大量的骨角器以及骨角料等共出于一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器物组合。其次，尽管报告对个别陶器年代的判断有误，林氏还是正确地指出大辛庄遗址主体堆积是商文化，同时根据少量精制的磨光陶片，认为该遗址伴存有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遗存^③。这一点为后来的调查和发掘所证实。第三，在报告的技术处理方面，于文字描述之外，配以遗址位置图、遗址外景照片和器物照片、线图、拓片等，显示了作者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正是通过林氏的报告，大辛庄遗址才逐渐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知晓，这批材料也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山东地区商代考古为数不多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

① 现在该馆任职的文德安（Anne P. Underhill）博士提供此信息，谨表谢意！

② 罗香林：《林仰山教授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关系》，《大成》1975年16期。

③ Drake F S. Ancient pottery from Shantung. *Monumenta Serica*, 1940, 4(2).

新中国成立之初，围绕大辛庄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分布面积，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再次进行多次考古勘探、试掘和调查，使我们对该遗址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1952年和1953年，山东省文管会调查大辛庄遗址，发现少量甲骨，其中有龟背甲。陈梦家指出：“小屯以外，别地方只出腹甲，出背甲的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它的形制和小屯的无异，它和小屯的关系最密切了。”^①

1955年冬，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对大辛庄遗址进行勘查，明确了遗址中心大约以“蝎子沟”为南北中线，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沟的东西两岸，重点保护面积约10余万平方米。通过对“蝎子沟”两岸两条3米×10米探沟的试掘，首次揭示了遗址中汉代层→东周层→商代层的堆积序列，证明了商代遗存是遗址的主要堆积这一事实。报告的作者认为：“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有一些接近郑州二里冈的殷代遗址。”^②这是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东部地区首次发现早于殷墟文化的商代遗存。发掘和采集的釉陶片和印纹陶片，在当时北方地区十分少见，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铜锯是商文化中罕见的工具种类，锯身厚度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骨角料上的锯痕正相吻合。白陶和数量多达85片的甲骨的出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此外，铜矿石的出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之处。

1958年冬，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再次对大辛庄遗址进行钻探和试掘，确定了遗址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此次试掘共开5米×5米探方两个，东西排列，地点位于“蝎子沟”西侧的中心部位，获得了与第一次试掘大致相同的地层堆积。而且，此次发掘将商文化层分作两层，预示着该遗址商文化遗存进一步分期的可能。遗迹方面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一组四个圆形似柱础的遗迹，“作东南、西北向排列，间隔距离大致相等，直径50厘米左右，高出生土面50厘米左右”，透露出该区域可能存在着大型建筑基址。发掘区内虽然没有发现墓葬，但调查中所见完整的鬲、豆、簋等陶器组合，使人们有理由推断商代晚期墓葬的存在。遗物方面，釉陶、印纹陶和白陶的数量又有增加，新出甲骨10片。大量的兽骨中可识别出种类的有水牛、马、狗、羊、猪、鹿等，是同类遗址中少有的^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曾于1955年至1963年多次调查大辛庄遗址，采集到陶器、玉石器、骨角器和甲骨等大量遗物。“由调查的资料来看，大辛庄遗址的文化遗迹很丰富，除了遗址上层有汉代、战国的遗物外，仅就殷代遗迹而论也不单纯，它包含了早商以至于殷末（或西周初）的东西。”^④这一推论为后来大规模的发掘所证实。采集的遗物中有一件青玉戈，器物虽残，只剩下内部和援的后半段，但该器器形硕大，磨制精细，显非普通之物。无独有偶，调查中再次发现一块铜矿石，足以引起人们对此类

① 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5期。

②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11期。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4期。

④ 蔡凤书：《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3年5期。

遗物的重视。

大辛庄遗址规模之大,出土遗物规格之高,都昭示着它在商代曾经有过的辉煌。1970年12月一次偶然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次偶然的发现出土青铜器6件,器物组合为觚1、罍1、盃1、刀1、戈2。报道者指出:“过去山东出土的商代铜器,多属于殷墟文化晚期,大辛庄这组铜器的特点与安阳小屯M331相近,应属殷墟文化早期,这在山东还是第一次发现。”^①实际上,这组器物的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整坑器物大致相同。只不过,人们对早年出土的那批资料不太熟悉而已。当然,这批资料的重要并非仅仅是因为其年代较早,更因为其铸造精良,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的大辛庄有着不同于普通遗址的显赫地位。

1982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遗址西南部清理了两个属于龙山文化的灰坑,证实了林仰山早年关于大辛庄遗址存在黑陶文化的判断。同时清理的一座商代墓葬,时代为殷墟文化一期^②。

1983年,济南张马屯村民在村南取土时发现一件铜钺。铜钺的内部居中,刃部为圆弧形,整体形状略呈球拍状,中部有一直径较大的圆孔^③。此种形制的铜钺不见于安阳殷墟,只见于年代较早的郑州商城和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它的出土,一方面说明大辛庄遗址的面积比原先认为的要大些,尤其是向东已延伸至张马屯村南;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遗址早在殷墟期之前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1984年秋,为进一步搞清大辛庄遗址内涵及其所含商文化的性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济南市博物馆的积极配合下,对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开5米×5米探方39个,实际发掘面积约880平方米,获得了包括陶器、蚌器、骨角器和青铜器在内的大量文物。发掘者指出:“这里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证实了是以商文化为主体,同时又包含有较多的地方文化因素。”提出了商文化大辛庄类型的命名。同时认为,大辛庄早期堆积中以素面夹砂红褐陶为代表的一群器物,与岳石文化的陶器有极大的一致性,称之为大辛庄第二类遗存^④。发掘者同时报道了征集的几件商代青铜兵器^⑤。

此次发掘证明,大辛庄是一处集居址和墓地于一体的大型商代聚落遗址,像这样功能齐全的综合性遗址,在我省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发掘证明,该遗址商代文化堆积复杂,出土遗物丰富,是解决山东地区商文化年代序列的理想地点。发掘者根据所获得的七组地层叠压和打破关系,将商文化遗存分作七期。这一划分,基本建立起鲁北地区商文化陶器编年体系。

①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② 任相宏:《济南大辛庄龙山、商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8期。

③ 郑岩:《永远的孔子》,《山东省博物馆赴台文物展览图录》,2002年,40页。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6期。

⑤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商代青铜兵器》,《文物》1995年6期。

三、2003年的考古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20世纪最后的20年是海岱地区商代考古快速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便是商文化编年体系的建立，大辛庄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研究的进展。此后，随着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泗水尹家城、菏泽安邱垆堆^①、邹平丁公、济宁潘庙和泗水天齐庙等遗址的发掘和资料的及时公布，海岱地区商文化编年建立并日渐完善起来^②。稍后，通过对淮河流域及其以东地区商代遗址的发掘，学术界对于胶东半岛区与商文化并存的土著文化的面貌也有了新的认识^③。

上述成果的取得，为海岱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综合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时空框架。2003年春季的考古发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有关这次发掘的资料正在整理当中，现在只能根据初步整理的结果，谈点不成熟的认识。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无疑是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尤其是经拼合后最大的一片龟腹甲，记述了当地统治者卜问“御祭”“温祭”和“徙（出行）”方面的内容，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武丁时期殷墟以外商代地方贵族祭祀和日常活动的文字信息。这些文字除了在行款和个别字的写法上具有自身特点之外，总的方面又与殷墟卜辞保持相当高的一致性。不过，这些地方贵族有自己的祭祀对象和祭祀方式，由此可见他们应该具有宗教方面的独立性，学者因此推测大辛庄是殷墟以外非王的地方贵族家族居地^④，是有道理的。

此次考古发掘中族徽的发现，为大辛庄商代家族的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两件铸有“𠄎”字铭文的铜爵（图一）出自同一墓地，时代属殷墟文化三期，比上文提到的卜辞时代要晚一期（大约四五十年时间）。因为两者之间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我们尚不能断定大辛庄卜辞是否出自同一家族；而且，现已查明，大辛庄商代家族墓地并非一处，将来很可能会发现其他族徽。新发现的这个族徽从辛从又，像以手持辛之形，可隶定为“𠄎”字。该族徽不见于以往的铜器著录。结构相同的甲骨文，见于《殷墟书契续编》二、一八、一，1965年版《甲骨文编》将其列入合文二六，释为“又辛”，因在卜辞中作“小辛”连用，且为受祭对象，故《甲骨文编》谓“疑辛字别



图一 大辛庄M72：8
铜爵铭文

① 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1期。

② 陈淑卿：《山东地区商文化编年与类型研究》，《华夏考古》2003年1期。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潍坊会泉庄遗址发掘报告》，《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119～132页。

④ 朱凤瀚：《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刍议》，《文史哲》2003年4期。

体”。这个从“辛”的族徽，很容易使人将其与“大辛庄”的得名联系起来，因为上古地名流传后世的例子并不少见（著名的如商丘、殷墟和郑州的管地等），这种联系并非毫无道理。不过，因为缺少中间环节，这样的联系目前毕竟还只是猜测。

此次发掘基本验证并细化了大辛庄类型商文化的分期，再次揭示出当地“商化”的过程。商文化出现在大辛庄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二里冈上层一期，这在山东地区所见的商文化中是最早的，说明商王朝在其向东拓展的过程中，最初是突发式的军事征服。二里冈上层二期至殷墟文化二期是大辛庄商文化的全盛期，高规格的墓葬和甲骨卜辞均出现于这一时期。这表明，大辛庄作为商人统治东方地区的中心，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殷墟三期开始，大辛庄商文化出现式微迹象，至殷墟四期时已退居为普通聚落。与此相应，青州苏埠屯等分布靠东的遗址此时正经历着它们的繁荣。这应该与商王朝对东方的战略中心继续向东扩展有关。商人向鲁南地区的扩张，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

据文献记载，商人对东方的扩张始于商代中期的商王仲丁、河亶甲伐蓝夷、征班方。此后，河亶甲迁相、祖乙居庇、南庚迁奄，据考证都与东方地区有关，如相在安徽宿州符离集，庇在今鱼台，奄在曲阜鲁地^①。上述记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一直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明显迹象是，二里冈上层正是商文化向周边地区大力拓展之时。其向东方的拓展，恰可与仲丁、河亶甲东征之事相吻合。但考古学上同样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从早商至晚商，商代都城经历了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几个地点，它们在时间的延续性上环环相扣，规模上在当时也都是无可匹敌，为当时的都城无疑。因此，已不大可能在它们之间再容纳下其他的商代都城。就是说，商代的统治中心始终没有离开今天的河南省境内。这样看来，文献上相沿成习的商都屡迁之说，值得重新考虑。那些所谓的“都”，很可能是商王出于军事或其他目的的需要而临时驻跸之地。学者指出夏商时期曾经有过两都或数都并存的现象^②，原因盖出于此。至于商代的大辛庄是不是曾经充当过这样的“都”，还有待于更多的发掘工作。

四、2010年考古发掘新收获

为进一步了解大辛庄遗址的文化内涵，配合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学生实习，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3~12月，山东大学考古系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济南市大辛庄遗址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发掘。本次发掘区域分别位于蝎子沟东西两侧，总面积为2000平方米。其中蝎子沟以西主要为生活区，出土了丰富的日常生活遗物；蝎子沟以东揭露一处商代墓地，并发现一座回廊式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249~252页。

② 李民：《南亳、北亳与西亳的纠葛》，《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夯土建筑基址。

本次发掘的商代墓地年代跨商代前期晚段至商代后期，墓葬按时代先后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墓葬墓圻较大，时代为商代前期晚段，虽大多早期被盗掘，但残存随葬品仍反映出其当时应属高规格墓葬。现举两例说明。M139墓室长3.22、宽2.24、存深1.57米。方向220°。可辨殉人3具。葬具为一棺一椁。早期盗洞中可见大量铜片和金箔片，清理随葬品18件，包括青铜器14件、石磬1件、玉器2件、涂朱圆陶片1件。其中一件铜鼎和铜钺，器形较大，器身厚重；一对铜盃，纹饰精美，器形独特，前所未见。该墓葬出土器物规格之高，组合之齐全，为同时期我国东部地区所仅见。M216墓室长3.8、宽2.2、存深2.8米。墓向217°。有殉狗6具，殉人8具。在西侧二层台殉人身下约0.1米处发现有整齐排列的11个铜泡。早期盗洞中有大量金箔碎片和绿松石片。

第二类墓葬时代为商代后期，墓向多在190°~220°。铜器墓出土礼器组合以觚、爵为主，兵器组合包括戈、矛、刀等，陶器组合为鬲、豆、簋或鬲、豆、罐等，墓底多铺朱砂，均有腰坑，盛行殉狗。小型墓墓圻较小，随葬陶器有单件鬲或盆，或鬲、盆等陶器组合。铜器墓举两例说明。M225墓室长3.3、宽1.86、存深4.2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间有殉人1具。随葬品共23件，其中青铜器16件、玉器3件、陶器3件，组合为鬲、豆、簋。其中青铜觶和小鼎铸造精美，纹饰复杂，表现了当时极高的工艺水平。小鼎的口部内侧和其中一件铜爵的鋈下铸有“剡”字铭文，其性质应为族徽。M256墓室长4.12、宽2.2、存深4.45米。西侧熟土二层台上有殉人骨架一具。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共36件，其中青铜器共31件、玉器1件、贝饰1件、陶器3件，组合为鬲、豆、簋。其中一件青铜双鸛卣，造型生动，做工精美，在山东地区同时代的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

此次发掘还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F61夯土台基呈长方形，方向为北偏东25°，复原长度东西约23米，南北约11米，总面积约253平方米。从已揭露部分柱础石排列情况，可推测F61四周均有回廊，回廊南北宽约2.5米，东西宽约2米。这种回廊式大型夯土建筑在大辛庄遗址尚属首次发现。F61遭后期严重破坏，仅残存垫土、柱洞和柱础石，出土物很少。从地层关系初步分析，F61年代大约属于大辛庄第五期，约当殷墟二期。

大辛庄遗址本年度发掘收获甚丰。以M139、M216为代表的一组商代前期晚段贵族墓葬，有的虽遭严重盗扰，但仍可判明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充分显示了大辛庄遗址在商代前期的重要地位。M225、M256是目前所见该遗址规格最高的两座商代晚期墓葬，加上时代稍早的大型建筑基址F61的发现，说明商代晚期大辛庄遗址在商王朝对东土的经略中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剡”是商代末年征夷方战争途经之地，带有“剡”字铭文的青铜器以前曾在鲁南的兖州出土，此次在地处鲁北的大辛庄遗址发现，对于研究商代末年征夷方战争的地点及路线，提供了新的实物及文字资料。此外，发掘收集的大量自然遗物标本，也为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食物结构和动植物遗存的文化含义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毫无疑问，上述发现将会极大促进商代考古与历史研究。

大辛庄发掘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从宏观上说，现在的山东大约与《禹贡》青、兖二州相当，而大辛庄遗址又有扼控水陆交通的地理优势，在贡纳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商代，作为商王朝长期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它到底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从微观上讲，发掘出土的大量人骨标本，是否能够借助DNA测序技术，为我们提供关于墓主人身份及其血缘关系方面的证据？包括动物和植物遗存在内的大量的自然标本，能为我们勾画出怎样的生态环境和食物结构方面的信息？这些都是未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所要回答的问题。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本文适当增加了2010年发掘的新收获，是为代序）

目 录

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代序）	方 辉（i）
SHANG DYNASTY FIND AT TA-HSIN CHUANG（大辛庄），SHANTUNG	 F. S. Drake（1）
山东大辛庄商代遗址的发现	F. S. Drake 著 何天行 译（9）
TA-HSIN CHUANG（大辛庄）AGAIN	 F. S. Drake（15）
大辛庄再发现	 F. S. Drake 著 惠夕平 译（25）
历城县王舍人庄商代遗址的发现	 F. S. Drake 著 何天行 译（29）
对大辛庄采集的小型青铜锯的意见	 王思礼（34）
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35）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41）
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节选）	 齐文涛（50）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	 蔡凤书（52）
济南大辛庄龙山、商遗址调查	 任相宏（58）
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商代青铜兵器	 徐 基（63）
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	
.....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博物馆	（66）
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	 方 辉（88）
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92）
2003年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收获	 方 辉（103）
记两件流失海外的大辛庄出土商代青铜器	 方 辉（110）
济南市小清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	 方 辉 钱益汇 陈雪香 蓝秋霞（114）
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137）
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87）

SHANG DYNASTY FIND AT TA-HSIN CHUANG (大辛庄), SHANTUNG

F. S. Drake

(Cheeloo University)

In the spring of 1935 I was told of some bone arrow heads and other objects found in the side of a gully in the loess near the Kiao-Tsi Railway somewhere east of Tsinan. While endeavouring not to appear too anxious to possess these, I tried, without success for nearly a year, to get a glimpse of them. In the winter of 1936,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an archaeological ramble, I was shown the site from which the bone arrow heads came, and after a few months more of negotiations they came into my possession. The site was one of the many east of Tsinan, from which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procured a number of complete pottery vessels, some stone implements, and innumerable potsherds, dating from Neolithic (Black Pottery Culture) and Shang Dynasty times. The pottery from these sites has already been described by me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s: "Ancient Pottery from Shantung" ;

"Shang Dynasty Site at Li-ch'êng (Wang-shê-jen-chuang), Shantung". "Neolithic Site at Hung-chia Lou, Shantung" , which are expected to appear in *Monumenta Serica* vol. IV, fasc. 1; *The China Journal*, Vol. XXXI No.3, September 1939; and th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respectively.

The Ta-Hsin Chuang (大辛庄) site lies south-east by east of the village of Ta-Hsin Chuang, which is about four miles north-east by east of Tsinan, and a few hundred yards north of the Kiao-Tsi Railway. A cart road runs north-eastwards from Tsinan to Ta-Hsin Chuang. At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village a road branches off south-east by east and runs diagonally towards the railway, which it crosses at a distance of about half a mile. For the whole of this distance it runs through a gully some six to eight feet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fields on the either side. The width of the gully varies from about fifty yards at the western or village end, to only a few yards at the eastern end where the road crosses the railway, as seen on the accompanying illustration (Figure 1 & 2). The banks on either side of the gully are rich in potsherds of ancient date. By their texture, shape and basket-pattern they resemble the rough

household pottery of Shang times. Several complete vessels so far recovered resemble the pottery of the Chow Dynasty but amongst them has recently been found a *li* (鬲) tripod of Shang or Neolithic type. Stone implements and fragments of worked bone and deer-horn have also been recovered.



Figure 1 Shows the Ta-Hsin Chuang site recently discovered. The view, looking west, shows the gully the banks of either side of which are rich in potsherds of ancient date



Figure 2 Another view of the Ta-Hsin Chuang site near Tsinan in Shantung. The site is shown looking east, the dark spot in the embankment of the gully indicating the pit from which objects were taken

The earth of the region, as is usual on ancient sites, is rich in organic matter. It is continually being carted away by the peasants to fertilise their fields. In this way the banks are constantly being dug away, and potsherds and stone implements disclosed and scattered. Others no doubt are carried away and spread elsewhere with the earth. The site as such, therefore, is being progressively destroyed.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s from the site are those illustrat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These all came from one pit i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gully towards the eastern end (Figure 3).



Figure 3 A close-up of the pit from which potsherds and stone implements, undoubtedly belonging to the Shang Dynasty, were taken

They were found accidentally by a peasant, along with, it is said, some bronze vessels, which found their way to one of the larger markets. In digging these objects out, and in searching for others, a large pit was made in the bank, and afterwards partly filled in from below.

The objects that came into my possession are illustrat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and described below. They are all typical of the Shang Dynasty, as can be seen by comparison with those illustrated for instance

in "The Birth of China" by Creel (Jonathan Cape, 1936, plate VII.) and "The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in London" (Burlington House, 1936). The site, therefore, can safely be regarded as a Shang Dynasty burial ground, a conclusion supported by the abundance of potsherds, apparently of Shang Dynasty type, that have been found in the gully.

DESCRIPTION OF OBJECTS

I BONE

(1) *Sixteen bone arrow heads*

[Figure 4(1~15), Figure 7(1~16)]

Of these the majority are in an excell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especially the one shown in Figure 4(6), and Figure 7(6); but some are badly corroded; several are slightly tinted green in parts by their proximity in the ground to bronze objects; in particular the one shown in Figure 4(10) and Figure 7(10) is stained a deep green all over. It has clearly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some bronze object, which from the way in which the two fit together, appears to be the bronze arrow-head shown in Figure 5(4) and Figure 8(4). The arrow head shown in Figure 7(16) was acquired later than the others, and does not appear in the photograph (Figure 4).

There are several distinct shapes:

(a) both faces convex (lense-shaped section)

Figure 7(4)(6)(15)(not flanged)

(b) one face flat, the other ridged (triangular section)

Figure 7(2)(not fanged)(7)(8)(9)(14)(16)

(c) one face slightly convex, the other slightly ridged

Figure 7(1)(3)(5)(10)(13)

(d) broad head with extended flanges, and long slender tail for insertion in the bamboo shaft, somewhat resembling the bronze arrow-heads shown in Figure 8(5) and (6)

Figure 7(11)(12)

(e) not flanged (see above)

Figure 7(2)(triangular) (15)(lenticular)

(2) *Three notched bone ends for arrow shaf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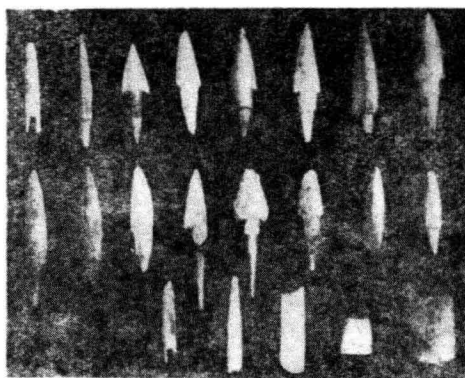


Figure 4 Bone arrow heads and other implements discovered at Ta-Hsin Chuang. The photograph contai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upper row: (1~7; 16), middle row(8~15), and lower row(17~21)

Figure 4(6)(20)(21) Figure 7(17a)(17b)(17c)

(3) *Two fragmentary convex objects of bone*

Figure 4(17)(18) Figure 7(18a)(18b)

These each appear to be a segment of a bone ring or band for fitting to a wooden or bamboo rod, as the shaft of a spear. They are both smoothed on the outer or convex surface only, the inner or concave surface being left rough. The sides of both are fractured, showing that the objects are not complete, whereas the top and bottom edges of each have been cut. The sides of the larger one are parallel, but those of the smaller one converge towards one end. The edge of one end of the larger one is squared, that of the other end is rounded towards the convex surface; of the smaller one the edges of both ends are squared.

(4) *Fragment of unknown bone object*

Figure 4(19) Figure 7(19)

Worked on outer surface (flat), on each side and at rounded end; the other end broken; inner surface split and not otherwise worked.

II STONE

Stone axe bead

Figure 5(1) Figure 8(1)

Of the usual Neolithic and Shang flat rectangular type, perforated with one hole. Greatest length 5.5 ", breadth 2.62 ", thickness 3 ". Fragile white stone, perhaps decomposing jade, hole perforated from both sides, fractured across the middle. Probably for ceremonial and not for actual use.

III BRONZE

(1) *Bronze javelin bead, broken*

Figure 5(2) Figure 8(2)

(2) *Point of bronze spear bead*

Figure 5(3) Figure 8(3)

(3) *Three bronze arrow beads*

Figure 5(4)(5) Figure 8(4)(5)(6)

The one shown in Figure 5(4) and Figure 8(4) is thickly encrusted with green patina one side, and appears to have lain against the bone arrow head shown in Figure 4(10) and Figure 7(10). The one shown in Figure 8(6) was acquired later and does not appear in the accompanying photographs.